

官场怎么就成了高危行业

诱惑巨大、权力集中、制约监督乏力、制度执行不到位是重要因素

近年来,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群因不断出事而见诸报端。一类是煤矿工人、矿井工人;另一类为落马贪官、问题官员。这两类不同的群体原本没有多少可比性,但人们却冠之以一个同样的词汇——“高危”。

当官也高危,是不是个伪命题?据调查显示,44%的受调查者认同“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”。那么,官员的高风险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突出特征?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?应如何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,使政府部门的要害岗位,不再“高危”?



官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,44%的人表示认同

调查

涉地、涉房、涉矿 领导干部风险最高

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调查6810人的结果显示,44%的受调查者认同“做官风险高”,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、交通厅长、县委书记、公安局长、组织部长、建委主任、安监局长、市委书记、国企老总、房管局长。而“岗位的实权较大”“岗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”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“做官风险高”的主要原因。

也就是说,人们认为上述岗位的风险性最高,主要基于三个判断依据:一是从“出事”的可能性看,这些都是“很有油水”的岗位;二是从实际情况看,已被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查处、并被媒体广泛曝光的贪腐案件中,这些岗位出现的几率都很高;三是从自身和周围人群的感受来看,人们对侵犯自身利益的腐败活动最深恶痛绝。如此一来,国土局长、建委主任、房管局长、安监局长等“涉地”“涉房”“涉矿”的领导岗位,竟在前10名中占了近一半,就不奇怪了。

为什么这些领导岗位会成为高风险岗位?这些领导岗位都属于公共资源密集的行业或部门,项目密集、资金密集、权力密集。有的握有巨额的财政、信贷资金,有的可以决定重大投资项目和工程花落谁家,有的掌握着高回报行业的准入权。因此,包括私人老板在内的一些市场主体,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资源优势,便把收买公共权力,作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之一。在猛烈的糖弹攻击下,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。

对一些“出事”的领导干部的调查表明,在权力高度集中、缺乏制约监督上,都惊人地相似。例如作为行政部门领导的交通厅长,经常同时兼任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,或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的董事长,作为后两个机构的“法人”,决策可以避开交通厅党组的监督;而后两个临时机构的班子成员,更没有能力制约唯一的政府代表。

因此,诱惑巨大、权力集中、制约监督乏力、制度执行不到位,是导致这些领导岗位成为“高风险岗位”的三个最重要因素。

观点一

风险是官员自己造成的

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

“高风险”在中国是确实存在的,这是因为中国现在、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机制转轨期。

如果官员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,背离了党纪政纪的要求,那么这个岗位就变成了高风险岗位,所以说,这种风险还是官员自己造成的。

“官场高风险岗位”是个怪胎

所谓的“官场高风险岗位”(如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、公安局长、交通厅长)都是老百姓眼中的肥缺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,是因为所谓的“官场高风险岗位”,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描绘,是中国体制下的一种怪胎。从世界范围来看,这种情况并没有普遍性,

不是说政府公务人员或者从事公共治理的岗位都是高风险岗位。治理腐败好的、体制机制健全的国家,他们的要害部门,都算不上是高风险岗位。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所谓的“官场高风险岗位”?这是个畸形的产物,是特殊情况下出现的,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体

制机制问题,并非是岗位本身。从现象上来说,“官场高风险岗位”虽然不具备世界的普遍意义,但是“高风险”在中国是确实存在的,这是因为中国现在、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机制转轨期。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深入,社会转型加快,另一方

用风险规避机制打“补丁”

相对于冒着生命危险的一些高危岗位,这种“官场高风险”体现在关键岗位上,比如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,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,这种风险的特征是:当一种权力很大的时候,可能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。有人说,如果能做到廉洁奉公,这些岗位就不存在风险。如果官员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

和行为,背离了党纪政纪的要求,那么这个岗位就变成了高风险岗位,所以说,这种风险还是官员自己造成的。

风险既然存在,就应该有相应的风险规避机制,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:

一是要有完整的法制框架。法律不授权,政府无职权。所有

权力都要有法律依据,要依法行政,建立法治国家。

二是官员队伍大,权力链条长。要通过监督机制规避风险,不能只让中纪委起作用,让各级纪委发挥作用是治理腐败的重要途径。此外,现在有了网络,网民通过网络这种强大的呼应效应把政府推到聚光灯下,从这个



汪玉凯

面对公权力的制约一直没找到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约束机制,导致在某些方面出现权力泛滥。不是仅仅领导干部有可能腐败,每个岗位上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资源,如果掌握公共资源的公权力得不到制约,谁都有可能走向反面,这是人性使然。

意义上说,网络监督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。

三是净化社会环境。要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,彻底消除这些庸俗的吃喝风、请客送礼风。哪怕是绝大多数官员做到廉洁奉公,相信老百姓不会主动送钱的,官员廉洁和社会风气的提升都是相互的。

观点二

压力变动力的风险是好事

谢志强 中央党校教授;吕鹏 中央党校研究生

中国目前的社会风险已经渗透到了不同的阶层、群体和个体。

对于官员的腐败型“高危”,体制的漏洞和不健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。

党的反腐倡廉工程、网络社会的舆论监督、各种净化党风政风的积极行动,构成了一个强大的、全方位的官员监督机制。

社会风险已渗透到不同的阶层

中国目前的社会风险已经渗透到了不同的阶层、群体和个体。例如对于工人来说,风险就是职业高危和失业风险;对农民来说,强制不规范非人性化的征地是最为严重的风险;对普通市民和中间阶层者而言,房子、就业、孩子教育、医疗等现实的潜在的开支巨大,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入贫困;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官本位、就业

难环境下新的读书无用论无不因扰着他们的良心,还有亚健康、“过劳死”的隐忧;对官员群体而言,各方面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多。

目前有不少人将官员视为高危职业,其原因主要是官员面临着以下几种风险:

责任性风险。现在“一把手工程”越来越多,问责方面越来越宽,问责制度越来越严,压力自然大了。

道德风险。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和执行中的不力等原因,官员很容易在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上落马。

能力风险。对个体而言,部分官员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够,不能很好地履行和扮演公仆的角色,于是乌纱帽不保。

制度性风险。公务员框架内实施的各种政策本身带有各种



谢志强

“风险”。稳步推进的党内改革和政府改革,已经使得原本的铁饭碗变成“瓷饭碗”。日益加大的反腐力度和工作难度,使得官员压力渐增。

职业性风险。某些工作岗位的内容和属性,注定了它具有较高的风险性。例如经常与金钱、重大项目等打交道的官员,犯错误的概率就要高很多。

区别官员高危与普通职业高危

首先,一种是属于责任型公共权力高危,一种属于个人义务型高危。官员是社会公职人员,官员的作为更多地带有公共责任的性质,普通职业的高危则更多带有个人义务的性质。两者比较,一个影响面大,一个涉及面小;一个是公权,一个是私权;风险出现后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。

其次,一种是属于发展型高

危,一种是属于生存型高危。官员的高危,更多的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,履行社会公共责任过程中出现的高危,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,它属于发展型风险。而建筑业工人、采掘业工人、农民等则是典型的生存意义上的高危。

第三,一种是弹性高危,一

种是刚性高危,改变的可能性和操作空间很不相同。对于官员的腐败型“高危”,体制的漏洞和不健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。这种高危可变因素多,改变余地大,属于弹性高危。而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,无论外界条件如何变化,这种高危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善,这就是刚性高危。

为官高危暴露中国吏治存在问题

风险固然令人担忧害怕,但积极地把压力变动力的风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为官的压力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为官的高危在当下无疑暴

露了中国吏治方面存在的问题,但也反映出了一个积极的趋势,那就是公众的监督、党和政府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且成效显著。党的反腐倡廉工程、网络社会的舆论监督、各种净化

党风政风的积极行动,构成了一个强大的、全方位的官员监督机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官员岗位的高风险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。

《人民论坛》

白斑

治疗费优惠 50%

无锡双拥医院白斑治疗中心率先引进308细胞再生系统以来,已使众多白斑患者得到康复。患者可现场目睹黑色素细胞成活过程。患者可直接拨打0510-85507699报名登记。据悉中华医学会白癜风专家刘耀荣教授每周一至周六亲自坐诊!